

楊培新

香港《文匯報》首任發行人 經濟學先驅 憶創報艱辛



楊培新1948年在香港《文匯報》。



本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長秦占國（右2）一行代表報社看望楊培新（中）。

王曉雪攝

為金元券幫腔的報紙銷路下跌。幾乎是《文匯報》增加一份，他們就跌一份，在中間階層展開銷路爭奪戰。這樣，《文匯報》就站住了，威信日高，打響了第一炮，也可以說是首戰告捷。」

港英刁難 被罰10元

儘管香港《文匯報》首戰告捷，爭取到了中間階層讀者，但《文匯報》經費依然困難，幾乎天天為籌集印報的白報紙而發愁。所幸《文匯報》聲譽日隆，願意幫助的人越來越多，困難不斷發生，不斷得到解決。

楊培新說，「我醉心於經濟新聞和經濟研究，不願意搞經理工作。但徐鑄成等希望我當經理，而且說這是報紙生存的關鍵。我勉為其難。當時資金主要由民主黨派籌措，但香港的銀行家鄭鐵如、莊世平，企業家章乃器、王寬誠、黃長水、莊希泉也給了很大支持。」

在訪問過程中，楊老向記者憶及《文匯報》創刊時被罰10元港幣的故事。南京、上海解放以後，民主人士和新聞界人士紛紛北上，徐鑄成也應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由楊培新擔任印人。那時，劉思慕任總主筆，對國民黨紫水晶號逃離南京發表社論加以譴責。隨後，香港政府衛生署忽忽派人來查報館廁所，指出人多廁所少，違反衛生條例，向法院提出控訴，而香港政治部人員則委婉地暗示，希望少和英國人正面相撞。

「法院通知我出庭，那天我作為法人代表，排隊入庭，前後是些小偷、妓女。我入庭後，被判罰款10港幣，如果沒有錢要入獄。我當即交了10港幣。」他說，英國那時在香港頒布的法律多得不可勝數。平常並不嚴格執行，但一旦用得上就援引這些條例懲罰一通，「給點顏色看看」。

楊培新簡歷



1995年的楊培新。

楊培新，1922年生於廣東省大埔縣百侯鎮。香港《文匯報》創刊時任經理、發行人。1949年起協助中國人民銀行南漢宸行長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創建金融研究所。中國當代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和嘉應大學校長。



楊培新作品《中國通貨膨脹論》和《新貨幣學》。



香港文匯報創辦初期部分同仁合影。前排：（左一）李碧依，（左二）劉湖深，（左四）馬季良，（左五）徐鑄成，（左六）楊培新，（左七）任嘉堯，（左八）胡星原；中排左三（蔣文傑），（左四）劉仕偉，（左五）陳欽源，（左六）王思曙，（左七）戚家柱，（右一）崔景泰；後排：（左五）黃立文，（左六）陳朗，（左七）劉火子，（右三）梅朵，（右四）米谷。

從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到任職央行首任行長秘書，從參與治理新中國兩次惡性通脹，到力推「承包制」改革主張，91歲的楊培新這一生坐言起行，書寫了叱咤風雲於香港報業、影響中國經濟進程的傳奇人生。在香港文匯報創辦65周年之際，楊老接受本報訪問，追憶香港《文匯報》初創時期的艱辛和榮光。他說，《文匯報》在港創刊時儘管經費困難，但憑借客觀權威的內地戰局報道與經濟新聞贏得了工商界人士的信任，一躍成為最受香港民眾歡迎的香港報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凱雷、海巖 北京報道

在國民黨查封上海的《文匯報》後，1948年，楊培新到香港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據楊老回憶，「1948年夏天，徐鑄成（香港文匯報創刊時總主筆）找我談話。他說，潘漢年（早期中共地下工作領導人）是他的親戚，最近向他建議，《文匯報》上海被封以後，已無復刊可能，不如到香港創辦《文匯報》。這是對國民黨最有力的抗議。」

轉戰香港 籌備辦報

按照徐鑄成和楊培新的決定，由欽本立留在上海，擔任上海特派員，浦熙修擔任南京特派員，潘靜遠為平津特派員。隨後，楊培新秘密離開上海。抵港後，楊培新等人住在荷李活道，並立即着手籌備辦報，他回憶說，馬季良、孟秋江等報業精英已先後到港。當時的文匯報由徐鑄成任總主筆，並擔任印人，馬季良任總編輯，金慎夫任編輯部主任，孟秋江任採訪部主任，楊培新則主持經理部並主編經濟新聞。

「香港當時人才濟濟，報紙很多，競爭激烈，《文匯報》要在這裡打響第一炮，確實很不容易。」楊培新感慨道。「香港《文匯報》在短時間內能站得住腳，應當歸功於徐鑄成的決策。徐鑄成確實是新聞界的一個奇才，『新聞鼻子』特別敏銳，善於自己動手採訪、寫作新聞和社論。他繼承了中國讀書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傳統，他不屈服於日本人的恐嚇和暗殺，不向國民黨的收買低頭，而和共產黨人合作。」

回想香港《文匯報》初創時的崢嶸歲月，時任香港《文匯報》經理、發行人的楊老，至今記憶猶新。令楊老印象最為深刻的，當屬新聞同仁筆路藍縷、迎難而上的新聞幹勁。楊老告訴記者：

「我白天是發行人、經理，晚上又是夜班編輯，連軸轉，但報紙一出即賣光，香港老百姓歡迎這份報紙，這鼓舞着大家堅持辦下來。」

被問及香港《文匯報》哪方面的報道最受歡迎，楊老說：「內地國共戰局的報道，香港社會最為關注，而所有報紙中，香港《文匯報》有關戰局的報道最客觀權威。那時不少報紙都有意、無意間掩飾、淡化國民黨軍隊的潰敗，真實的第一手消息很多來自於我們。同時，香港社會也非常關注內地的經濟、金融形勢，文匯報這一方面有着權威的消息與分析，因此備受關注。」

一炮打響 轟動新聞界

《文匯報》9月出版，當時恰逢淮海戰役和8月19日國民黨政府發改金元券。這兩件事震動了香港中層人士。《文匯報》稱國民黨軍隊為國軍，稱解放軍為共軍，既登中央社、外電的報道，又登新華社電訊，轉彎抹角透露出國民黨軍隊節節失利的消息。楊培新說，「徐鑄成等人巧妙地透露戰局的真實變化，吸引了廣大讀者。要知戰局變化，必須看《文匯報》。」

當時，國民黨發行金元券，各報紛紛捧場。但《文匯報》依靠上海特派員欽本立、南京特派員浦熙修，拿到國民黨中央銀行的金銀外匯儲備統計，說明國民黨在唱空城計，並測算出國民黨的空城計只能唱一個月、最多唱兩個月。由於《文匯報》報道的全是鐵的事實和確鑿的統計，工商界做生意必然碰到金元券，不能不考慮《文匯報》的報道。

果然，不到一個月，整個市場即陷於停頓。《文匯報》憑借真實、可靠的報道贏得工商界人士的信任。楊培新說，「香港報紙的批發市場在利源東街，每天《文匯報》的銷路都在增長，而

企業面向市場擴大消費品生產，迅速繁榮市場並緩解了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又通過發展生產解決了數千萬知青的就業問題。」楊斌說。

按照西方傳統理論，治理通脹、促進就業難以兼得，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做到了這一點，令許多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也讚歎不已。

助數千萬知青就業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再次面臨消費品嚴重短缺的隱形通貨膨脹壓力，同時數千萬知識青年返城，陷入待業難題。當時有經濟學家主張按照西方貨幣主義理論縮緊貨幣供給，不惜加重就業困難，來控制通貨膨脹。「但父親卻主張適度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通過支持國有

諾獎得主非常欽佩

特別是楊培新在應美國聯邦銀行邀請訪美期間，曾遇到現代貨幣主義理論的創始人、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港譯名「佛利民」），後者對中國治理通脹和解決失業成就非常欽佩。弗里德曼稱，倘若誰能解釋中國的成功，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治通脹谷承包 建功新中國

楊培新不僅是香港傑出報人，也是中國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在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後，楊老曾協助中國人民銀行南漢宸行長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創建金融研究所，並出版《中國經濟動向》、《中國通貨膨脹論》、《新貨幣學》等經濟學著作。楊老提出的承包制，成為上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劑靈丹妙藥，被稱為「楊承包」，與吳敬璉（「吳市場」）、厲以寧（「厲股份」）等著名經濟學家並列為經濟改革標誌性人物。

在拜訪楊老時，楊培新之子、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斌陪侍在楊老身旁。作為青年經濟學家，楊斌的經濟學研究深受父親的影響。談及父親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時，楊斌認為，除力推「承包制」理論外，當屬新中國兩次治理惡性通脹時，父親提出的貨幣供給主張。



1948年11月25日，本報關於淮海戰役版面。「淮海戰役」當年亦稱為徐蚌（徐州、蚌埠）會戰。



1948年9月13日，本報關於金元券統計分析版面。